

第十五章 日美中三国关系的正常化

“战后五十周年”与“侵略五十周年”

有一本书在“战后五十周年”即将到来的1994年12月25日问世了。书名为《我的抗日天命——一位台湾人的记录》（社会评论社出版）。作者是一位在日本住了三十五年、已过“喜寿”（77岁）的林岁德大爷，但正确地说此书是一群受作者充满血泪斑斑的人生之道的感动的日本年轻人，利用工作之余，直接聆听作者的评述、收集并整理无数的资料而写成的一部力作。

如过激的书名所示，书中处处出现的表现林大爷怨念愤怒之言，使得读者直觉得触目惊心。但林大爷过酷的体验、以及林大爷对此一直从正面进行斗争的姿态告诉了我们日本在“战后五十周年”的以前，对中国、朝鲜半岛等亚洲诸国的“侵略五十周年”的历史。同时也使人们再次看到了日本人，即使是在战后也一直遗留着这种“精神结构”。从这个意义来说，作者林大爷完全可以说是一位表现日本“黑暗一面”的活生生的证人。

与林岁德大爷的相识

我与林岁德大爷第一次相识是在二十七年前的一次反对战争和歧视的群众集会上。听说他的家乡是在台湾，对他就产生了一种亲近和怀旧之感。因为我自己从三岁到十四岁的十一年就是在台湾吃米粉长大的。林大爷当时腰杆挺直、身体健壮，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位正义感很强的人。

但不久我就被作为特派员派到北京，与林大爷的联系也因此中断了。我任期满回日本后，又赶上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先后去世、“四人帮”被捕、扭转文革路线等重大事件的连续发生，在报社总编室我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与林大爷再会已是1979年的秋天。他那时正在位于东京神田的明治大学本部作门卫工作。有一天晚上，林大爷利用换班休息的三十分钟，在大学附近的一家咖啡店与我进行了久违的交谈。林大爷虽然已过了六十岁，但看起来还很年轻，身体也很好。

他说在这儿一年的时间里，从来没出什么事故也没迟到、缺勤过，工作很努力。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提到月薪只有十万日元左右，是日本人同事的三分之一。他不抽烟、不喝酒、很正派，对自己严格要求，有着很大的毅力和工作责任心。对这一切我深感敬佩。

后来我还曾去他家拜访过。他住在东京文京区大家都经营的一套公寓里。两间榻榻米的房间各为六帖和四帖，另外还有一间三帖左右大的厨房。他跟他女儿住在一起，女儿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四帖的那间是卧室，六帖的那间只好做客厅了。

这间小小的客厅里堆满了老人自己做的一些急进的宣传画、照片、书籍和资料。特别是那些有关“南

京大屠杀”的残酷镜头的照片、参加南京之战的日本军一览表，以及其军事行动图，还有老人自己制作的“天皇制日本帝国的诞生与侵略中国主要年表”等，令人敬畏。

在这儿我第一次得以知晓了用语言难以表达意境的，林大爷所经历的坎坷一生的一端。

受难于被侵占了的台湾

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是在一百年前的 1895 年（明治 28 年）4 月 17 日。那是从“甲午战争”清政府被打败后签订了“下关条约”开始的。被侵占的初期，当地群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开始的二十年时间里不断有武力抗争发生。台湾总督府也一直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但在中南部的哆吧年发生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即两来庵事件（1915 年 12 月～1916 年 11 月）被镇压后，逐渐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政策。

林大爷就在这动荡时期的 1918 年（大正 7 年）5 月出生在嘉义市近郊的一户农民家里。他父亲一直是抗日游击队的领导成员之一，两来庵事件后回到乡里，开始经营甘蔗园。但林大爷六岁那年即 1924 年的秋天，借着殖民地命令，强行把林大爷家的约一百五十亩地的甘蔗园给没收了。那时林大爷亲眼目睹了他父亲进行顽强抵抗，但由于遭日本警察的殴打而神志昏迷，被迫在同意书上按指印的场面。

后来，作为“皇民化政策”的一部分，在公开场合禁止使用台湾话。林大爷考进了竞争率达十三倍的名门学校嘉义中学，但由于在就使用台湾话而遭惩罚的问题上与老师发生了争议，入学不久就被退学了。

“在受歧视遭同化的‘皇民化政策’之下，我们台湾人成了‘第四类日本人’。”——根据林大爷的分类，第一类日本人是日本本土的日本人，第二类是加入了日本籍的部落民，第三类是日本少数民族阿伊努族人及琉球人，最后第四类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人和朝鲜人。

残酷的南京扫荡

不久，发生了卢沟桥事件（1937 年 7 月 7 日），战火在中国全国蔓延，台湾也加紧了动员令。同年 10 月林大爷被强征为“军夫”，在接受了三个月的训练以后，被编入“进攻汉口”兵团，首先到达的是上海。

当时正值“南京大屠杀”（37 年 12 月～38 年 2 月）。林大爷等人被编入到属于“第十军”（司令官是柳川平助中将）的“南京扫荡队”，改变了去汉口的计划。

在一次南京郊外的扫荡中，林大爷走进了一户农家，看到一位老太婆正抱着一个生后五个月左右的婴儿，在地上磕着头饶命。他马上把他们拉到一个角落用稻草和柴火把们盖住藏着。可刚当他向一个上等兵报告完“没有异常情况”时，那婴儿却大哭起来。万事休已。那个上等兵猛地冲过去，把老太婆和婴儿都刺死了。他嘴里一边骂着“混蛋”，一边用枪托把林大爷打倒在地。就是从这天起，林大爷在心里发誓要坚决反战，并下决心要准备逃走。

39 年 1 月，由于要转战到南方，林大爷被迫又坐上军舰，几天后军舰到达了台湾的军事港口——高雄。林大爷得到几天休假，他马上直奔家乡去看望父母。然而，也许是高兴的见面使得母亲长期思儿的紧

张心情一下子放松了下来，母亲突然发高烧达四十度病倒了，得了急性肺炎于四天后就去世了。母亲去世三天后，父亲也得同样的病而撒手人间。林大爷悲痛至极，无法入睡，面容日益憔悴下来。

休假的期限已经过去了。但林大爷在南京所亲身感觉到的那种残酷凄惨的体验，再加上双亲在短时间内先后去世，使得他根本没有意思归队。他躲在一个亲戚家里，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他弟弟突然一脸恐惧跑来告诉他，说宪兵正在到处搜查他。兄弟俩再也没地方躲了，决心“两人一块儿去东京”。他们打定主意，从在当地开药店的婶婶那儿拿了两百日元，换上学生服打扮成学生，逃出了基隆港。

双亲去世后逃亡东京

兄弟俩在东京一位热心人家里寄住了下来，靠着在港口当装卸工、送报纸、送牛奶等活儿，来维持生活。不久全国发出了战争总动员令。总算免了服兵役，但不得不在一家军用工厂工作。好歹总算熬过来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了。

“可以放心地回家乡去了。”林大爷想到这儿，就马上开始着手准备回台湾的费用。他开始在黑市场上做买卖，在留有战火痕迹的新桥站前出售运动鞋和长统胶鞋。这些鞋是他直接从大阪的鹤桥塑胶厂直接买进的，他一个月去大阪五到六次，每次买回八十到一百双左右，这种鞋极为畅销，利润也是成本的三倍之多，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凑足了回台湾的费用。

可是，正当林大爷连给台湾的兄弟及亲戚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就要回家乡的1947年晚冬，在台湾发生了“2·28事件”。这次事件是由于台北的一位在摊点上出售假香烟的老太婆被警察殴打后，而在全岛引起的一次暴动事件。

日本战败后，台湾又沦到了从中国本土来的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先遣部队的无纪律性，官吏的横暴和贪污现象极为严重。米价高涨、就业极难，台湾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怨声载道。

“在五十年时间里，一直被视为‘第四类日本人’的台湾人，对来自祖国大陆的同胞予以热情的欢迎。可是这次事件使得我们的期望变成了失望。这次我们又成了‘第三类中国人’了。”

根据林大爷的分类，第一类中国人是中国大陆人，第二类是被大陆赶出来后统治着台湾的中国人，第三类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这次事件给林大爷打击很大，他苦思冥想只好放弃了回台湾的想法，决定了留在日本。

放弃回乡与日本人结婚

就在这时，林大爷由于缘分与一位日本女性结了婚。在上野车站他看到没钱买回乡车票的母女俩在发愁，就帮助了她们娘俩，这就使得他们有缘相识。林大爷当时在丰岛区内开了一家中国餐馆“醉月楼”。他与夫人生了一男一女，林家也开始慢慢有了生机。

但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各种问题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件事林大爷怎么也无法忍受。那是他女儿刚上文京区的区立中学后不久的事儿。当女儿告诉他“学校把我的手形和脚形及指纹都采了样本”时，他感

到非常气愤。女儿又没犯什么法，学校为什么要采她的指纹？

校长说是区教育局长的指示。问教育局长，教育局长说是某大学“法医学部”的一位教授的委托。林大爷马上找到区议会议员那儿。先是由社会党议员把这个问题提上去，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议员们都对此表示理解。最后，教育局长在议会上作了道歉，林大爷女儿被采的指纹以及手形和脚形的样本也销毁了。

林大爷在战前以及战争时期一直经受着艰难困苦，即使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他作为“在日中国人”（台湾人）经常也是受到歧视。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要了解日本人的精神结构和社会构造，还是最好与日本人劳动者一起工作干活才行。就这样，他加入了日本社会下层劳动者的队伍。

1975年（昭和50年）5月，林大爷第一次在日本的企业工作了。那是他五十七岁的春天，工作单位是位于东京银座的一家日本邮件邮递、南部包裹收发局。他在这儿当临时邮车助手，日收入四千日元，上班时不固定，有白班、夜班、还有深夜班。

在他干了快三年的一天，他在装卸包裹时被转送带上掉下来的大东西把右脚背给砸成骨折了。因为劳动基准监督署的负责人认为这次事故“不能算劳灾”，林大爷就同他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为此林大爷也被迫辞掉了工作。当他回顾这段时间时，他说“能跟日本的社会下层的劳动者同吃、同住、同劳动，意义很大。”

受歧视，换了工作还是受歧视

林大爷脚伤总算好了一点儿以后，他又进了一家总部在东京涉谷的公司——东急管财。由这儿他被派到明治大学当门卫。他打心底里希望这次能让他一直愉快、健康地工作到退休。但就在他当门卫当了三年零三个月的1981年9月1日，从东急管财寄给了他一封“不雇佣”的解雇通知书。

林大爷从未迟到也没缺勤过。他当门卫，对工作认真负责是出了名的。不管是来学校执行任务的警察也好、大学的教职员也好，只要“违反了规章制度”，他都要不客气地提出。对他这种做法，有朋友说“他或许还不知道，日本人的‘胳膊扭不过大腿’之说”。

但学生们都支持林大爷。他不但对校内的安全，对学生身边的安全也很关心，对警察要搜查自治会的房间曾提出过条件和抗议。学生们得知只有林大爷一个中国人被解雇，而且他的工资才只有日本同事的一半时，都表示很同情。

校内贴出了“反对民族歧视”、“保护林大爷”的标语口号。此事一经传开，在东京、大阪、名古屋、静冈、横滨、仙台等地还成立了“保护林岁德人权之会”，声援的范围逐渐扩大。

“保护林岁德人权之会”的代表与东急管财进行了三次交涉。我本人也曾经在上完夜班的一天以林大爷的朋友身份，去见了东急管财的负责人，希望能妥善处理此事。朝日新闻社会部的一位比我后加入社的记者还为此事进行了采访，并在报上进行了报道。

声援活动起了作用，此事最终以“在家任职”的形式达成妥协。也就是说，公司方面给发工资，但林大爷不能到学校上班。因为如果把林大爷解雇的话，学生及声援团体不罢休，如果到学校上班的话，大学

和警察方面又为难。对东急管财来说，此事的处理也可以说是“苦肉计”吧。林大爷称此为“失败的胜利”。

尽管林大爷不断遭到各种各样的“歧视”，但他一直有着要跟日本的“善良的百姓们”一起和睦相处的愿望。林大爷一家于1961年（昭和36年）搬到了文京区大冢三丁目的都营的公寓里，他住的公寓有五层，共住四十户人家。随着与邻近人们的交往不断扩大，心地善良的林大爷十三年来一直被推选为自治会会长，即使是他在明治大学当门卫的那段时间里，也没落选过。

还是要为邻近那人服务

门卫工作的时间是除了周末及假日以外，从下午三点到第二天早上九点之间的十八个小时。另外白天还有自治会会长的工作。分发区报，处理堵塞的水管，房子墙壁的粉刷及破损之处的修理等事要去跟东京都的有关部门交涉——林大爷说“睡眠时间只有三个小时左右。”碰到林大爷不在的时候，夫人幸子就去替他跑来跑去。不幸的是，心地善良，但身体虚弱的夫人由于劳累于1978年（昭和53年）夏天由于心肌梗塞而撒手人间。

林大爷除了担任自治会会长以外，还是该地区青少年对策委员会会员，曾被评为区政功劳者和地域发展及福利事业功劳者。他家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奖状，他还曾几次被任命为“人口普查员”，任命书上分别有佐藤，三木，铃木等三代首相大臣的签名。

“饮水思源，心怀祖国，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林大爷严以律己的生活信条。对此林大爷是这样解释的。

“我生活中所必需的东西，日本人民为我提供了。我作为一个人为了生存下去而奋斗时给我支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我的祖国是生我的故乡台湾和祖先之地中国大陆。我牢记着这两点，希望能为我现在居住的地区的人民全力服务。”

日本“黑暗面”的活证人

林大爷的明治大学事件有了着落后的不久，我于1982年初春被派到海外工作。先是担任香港特派员采访了中英两国谈判的全过程，后又调到新加坡，担任亚洲总局局长。回日本后，又担任中国，亚洲问题编辑委员。

回国后不久，正值《朝日新闻》准备从1988年（昭和63年）4月开始在晚报上发表题为“昭和人间史”的连续报道。这次安排的目的是要纪录报道那些被压在历史下层，但却是真正支撑着时代发展的“小人物”，而不是那些所谓的领导者或有权的“大人物”。

担任此次连载的记者都是阅历资深的编辑委员们。大家分担，每人平均六次连载。大家各显神通，通过连载报道“小人物”，使人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看到了昭和时代的真实面貌。不久，也轮到我该写了。

我脑子里一下子就浮现出十几个人的名字，但我最后还是决定写写林大爷。除了林大爷的波澜坎坷的一生以外，我决定写他的最大动机是由于前面连载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所谓的“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至

少从我的立场来看，我觉得我必须写写过去的“第四类日本人”。

回顾昭和史时，我们不能忘记，从那个“战败之日”起，在国籍上不再是“日本人”的人还有许许多多。他们就是家乡是从明治时代起就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和台湾的那些人们。

林大爷就正是这些人中的一位。他从幼儿时代到现在，与战前，战中，战后的全部昭和史结下了“奇缘”。他的悲惨遭遇，从社会底层反映了日本在昭和时代所走过的历程中的“黑暗一面”。

决不允许这种不幸重现

为了这次采访，我又开始请林大爷讲讲过去。正好这时应《朝日新闻》社的邀请，《人民日报》的采访代表团从北京来访，我负责陪同他们，不幸在陪同途中的北海道，我由于吐血而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幸好没什么大毛病，出院后不久，我又去采访了林大爷。

林大爷全力地给我进行了讲述。从1989年（平成元年）3月29日（星期三）开始分七次以“为拒绝按手印而斗争”，“相隔五十年后的访问中国大陆”为题以及林大爷近期的活动情况等，进行了连载报道。

从那以后五个月过去了，也正值日本将要面临“战后五十年”的之前，一群比我更加理解林大爷的一生，并跟林大爷并肩战斗的年轻人，用他们自己的手写出了有关林大爷的书。我真想对他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因为我觉得要把林大爷有时由于激愤而说出的话整理得让一般人都能理解，一定要费不少功夫的。

但是，此书年轻的作者们的写作手法与我这个吸进了不少人世间的“肮脏”和“羁绊”的人不同，把林大爷的话和心情直接再现了出来。而且他们还跑到国会图书馆等处，收集整理了不少珍贵资料，才编写了这部力作。

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这本书的编写。对那“过激的表现”不知有多少人抱有同感。说句直话，我还真有点没把握。

不管怎么说，林大爷的遭遇有着别人无法替代的分量。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读一下这本书。并且希望通过此书人们能重新认识日本人过去的生存方式，探索并找到今后的生存方式。同时也衷心希望此书能成为至今还无法解除怨恨万重的林大爷的“挽歌”。

最后，我想引用一下在采访林大爷时他说的一段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我一直只想希望自己能堂堂正正地、扎实而又轻轻松松地生活。但要想堂堂正正地生活却又无法做到轻轻松松。”

“我只希望像我这样不幸的人生不要重现。”

挖掘“共存”之井的周恩来

为了日中两个民族的未来，怀着相互共处的愿望和诚意，挖掘“共存”之井的先辈不计其数。如果要

问到在这些先辈中挖“井”最深的要算谁的话，也许回答“那当然是周恩来总理”的人是最多吧。我想，日中双方的人民都会这么回答的。

诞辰一百周年的现实意义

今年正是那位挖“井”最深，并为此建立了不朽功勋的已故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于江苏省淮安的一家没落的官僚家庭。在去日本和法国留学之前，他在天津的南开学校学习，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并结识了一生的伴侣邓颖超夫人（原全国政协主席）。党中央和政府于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到来之前，在被称为周总理第二故乡的天津开设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3月5日举行了盛大的开馆仪式。

在纪念馆开馆前，朝日新闻北京分局的局长加藤千洋参观了纪念馆，他就“现实意义”作了如下说明。

“中国正在积极开展反对干部的腐败贪污行为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迎来了已故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作为‘人民的公仆’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28日将在天津市内开馆的纪念馆里，除了展出了周总理为革命和建立新中国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以外，还特别强调了总理与邓颖超夫人的朴素的生活，以及‘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高风亮节的政治态度。中国当局在努力让人们能从深受爱戴的总理夫妇身上找到理想的‘廉洁奉公，反对腐败’的榜样。”

“人世间”在不断地变化，但永恒不变的“人生之路”却是永存的。周恩来夫妻的人生之路似乎是在向中国以及日本和全世界的人们无声地诉说着这个道理。

永远难忘的“五句话”

成为“日中握手”基础的是二十六年前日中邦交正常化时缔结的共同宣言和二十年前缔结的双方要世代和平友好下去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笔者就一直分别在北京和东京采访了这“两件大事”的记者之一。回顾往事，周恩来总理曾一直向日本方面呼吁的“五句话”至今还记忆犹新。

1.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2. 存小异，求大同。
3. 言必信，行必果。
4. 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5. 反对霸权。

以上这五句话在日中邦交正常化时都曾用过，特别是最后一句话，还是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交涉期间不幸病倒的周恩来总理的“遗言”。

简单地解释一下的话，这五句话里我觉得有着这样的含义。

1. 希望日本不要忘记对过去战争应负责任的“历史认识”，并且对此要铭记在心。

2. 日中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信念各自不同。在彼此相互认识的基础上，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为此要遵守包括“不干涉内政”在内的“和平五项原则”（相互尊重领土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不干涉内政”的核心在“台湾问题”上。

3. 以上两点在邦交正常化的日中共同宣言中已经坚决保证了，因此一定要执行。

4. 但是与过去两千年的日中友好历史比起来，日中关系从“甲午战争”到“日中战争”的八十年时间只是短暂的。今后两国要紧紧握起手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据笔者所知，中国与其他国家缔结重要外交关系时，使用“世世代代”这个说法的还只是对日本才用。

5. “反对霸权”的内容是“中日双方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而且也反对任何国家的霸权行为”。这个“反对霸权条款”在日中共同宣言的正文“第七项”中已明确记载了下来，但在后来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交涉中，由于当时一触即发的“中苏对立”，日方遭到了苏联方面的极力反对，说此条款是“反苏同盟”，使得条款的缔结不得不一度中断。关于此事的经纬在第九章的“日中友好和平条约纪实”中有着较详细的阐述。中国方面也顾虑到日本外交的基本政策，反复确认了这个条约不是破坏日本与第三国的关系，也不会为了反对霸权而去搞什么“共同行动”，这才最终在条约上签字。周总理在病危的病床上还指出“邦交正常化时缔结的中日共同宣言中明确记载的‘第六项’（和平五项原则）和‘第七项’（反对霸权）是非常重要的”，强调了要在条约正文中明记的必要性，最后把周总理的这个“遗言”写进了条约正文。

中国外交与日本不同，经常讲究战略战术。其中当然有着强大的政治伦理在起作用，但我认为周总理的政治态度的根底里有一种总是让人感到他对对方的那种诚心诚意的东西。

触动日本人心弦的人

周恩来总理是非常喜欢日本的。

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他不但接见日本的政府代表团，而且地方的代表团他也照样会见。那时日本方面不断提出要与中国的城市缔结“姐妹城市”的要求。汉语称此为“友好城市”。一下子提出“奈良和西安，神户和天津互结友好城市怎么样？”的就是周总理。日中两国之间的交流有着两千年的历史，以前称为长安的西安与日本的古都奈良如果结成友好城市的话，不是有着象征性的意义吗？另外，明治维新以后来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人中有很多就是坐船来往于天津与神户之间的。周恩来自己年轻时就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个，他说，“那时我就是在樱花盛开的季节，从神户的港口出发，回到天津的。”

接见日本文化节代表团时，周总理还问及到，“神田的旧书店街现在还是老样子吗？”“上野的森林怎么样了？就是有着西乡铜像的那儿？”他只在年轻时在日本呆过短短的一段时间，却能在对话之中触动日本人心弦，不愧是谈吐高明。

有一次日本各地在昭和年代出生的市、镇、村各级议会议长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在那次访华中，大家都希望，“请总理一定访问日本。”不知道总理日理万机是否能答应此要求，谁知道总理却感慨万分的答应道，“我也希望能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再去日本看看。”我当时也在场，那时总理那幅满腔怀念之

情的面容和样子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次在代表团成员中有不少人还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漫长历史作了反省。这时，总理总是说，

“跟两千年友好的历史比起来，那段八十年的历史毕竟是算短的。今后，我们紧紧握手就行了。”

日本给广大中国人民带来的侵略伤痕是残酷无情的。听说特别是在受害最深的东北地区（旧满洲一带）人们对总理的做法曾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总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直注视着日中关系的发展，努力作人们的解释工作，这里面周总理所表现出的机智，才华和气量，我们是永远不能忘的。

位于东北地区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我还曾去参观过。那时正值日本遭到石油危机，非常渴望能得到石油的时期。满身油腻的负责人给我看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周总理的直接指示。”电文的内容是这样的。

“同志们，日本的朋友们正面临着困难。望你们竭尽全力，不要耽误了运到日本的石油。”

总理宽广的胸怀和以诚相待的态度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与癌症搏斗，死而后已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听到讣告后令我感到无比的吃惊。总理的癌症早在1972年就发现了。我本人就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一个月前，即72年8月到北京赴任的。而且周总理在75年6月接见的最后一个由藤山爱一郎为首的日本代表团时，我还进行了采访，那是我作为北京特派员的最后一次采访。

在采访的后一半时间里，曾有周总理生病的传闻。但总理那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多次铿锵有力的讲话，怎么也难以让人相信他重病在身。一想起周总理那以国家利益为重，面对世界，耗尽生命最后一息的精神，实在是感慨万分。

周总理从发现癌症到去世这段时间里，实际上在公开场所露面达五百次前后。这里面当然包括迎送外国贵宾，出席宴会，接待代表团等，但如果把没有公开的参加党和国家重要会议等算在一起的话，就可以发现总理即使是在病中，也一直在进行着超人的工作。

他在这段时间里接见的代表团中，可以说要算日本代表团最多。而且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的，只要他有时间都尽可能满足代表团的要求。从凌晨三点到深夜，更确切地说是到黎明都在进行会见，而且星期天的会见还特别多。这都是周总理的周密考虑和精心安排。

周总理在住院前每次会见日本代表团时，我们日本人特派员都会事先接到通知。会见地点主要是在人民大会堂，我们一般都要比代表团先到那儿。会见次数足有五十多次。每次周总理总是在代表团到达之前就到了，用标准的日语跟我们打招呼，“你们好”，“大家辛苦了”，而且还一个一个地与我们热情地握手。握手时还仔细地对方，这一点是令人难忘的。就我们自己在场所见，总理跟任何人握手都是如此。这一点充分显示了总理的高尚人格。

有一次正值在巴黎就越南停战进行和平谈判，但美军军用飞机又开始了北越轰炸时，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招待会上出现了，他来到在那儿采访的驻京外国人记者团中间，听取每个人的意见。当时美国

及部分西方国家指责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的“顽固”。周总理问我“你是怎么想的？”我回答总理：“我反对美国的做法。这是非人道行为”。听了我的回答，总理微微一笑，说道：“与我们的看法一样”。

这一笑清楚地表明，虽然巴黎和谈已接近尾声，中美关系以尼克松访华为契机也进入了对话时期，但只要美国不停止侵略越南，中国将与越南人民一起“奉陪到底”。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

关于周总理要讲的是太多了。在此有一点我想要讲一下，那就是有关周恩来总理与开创了新中国的“建国之父”毛泽东主席的关系，以及他与在“毛周体制”后，扭转了文革路线，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在 1921 年成立的。自从党成立以后，先后由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陈绍禹（王明）和秦邦宪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在这期间，周恩来一直在党内占有重要位置，职务也在毛泽东之上。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受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指挥，一直在城市里夺取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扎根于具有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的中国大地，以发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民积极性，并强调要有组织化的重要性。为此，毛泽东每每受到从党中央领导班子里排挤出去的命运。

但是，在革命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在城市里直接夺取政权的作法越来越显示其的不实际性，毛泽东的想法却终于显示了其正确性。那是在 1935 年 1 月在举世闻名的历史性的长征途中，在贵州省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这次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周恩来在会上积极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并表示支持毛泽东，宁居领导之下。从那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手下，在漫长艰难的历程中，为革命和建设呕心沥血，奋斗不已。

毛泽东正是当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深受历史性的苦难时，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之心，并从中国大地中产生出来的一位领导人物。“遵义会议”把中国的命运寄托在了这位领导人物身上，因此它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个性鲜明，治理才能丰富的周恩来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掌握了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契机。正如还在延安窑洞里就立足世界前头预见将来的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故人）恰如其分地指出的一样：“周恩来从此以来，凭着一股埋没自己的献身精神，成为了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人物。”

当然，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是有血肉的人，因此到至今为止充满曲折的中国革命历程中，不能说两人之间没有一点儿不同的看法和矛盾。有人举出各种例子，加大说明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比如说，有人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曾极力保护了很多受到批判的党和国家的干部和政府官员，这一点与发动文革的毛主席是有着矛盾和对立的。但是，周总理不顾个人安危能够保护那么许多遭受批判的干部和重要人物这个事实，不正是充分证明了两位伟人之间的深厚信赖的关系吗？

这两位伟人之间的信赖关系是经过用了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漫长时间千锤百炼的，而且每一次新的严峻考验，使这种关系更深一层。我认为，至少这正是在中国革命巨大的洪流中所形成的两位伟人的实质的和本

质的关系。

周恩来重新引荐邓小平

下面再谈谈周恩来总理与邓小平的关系。众所周知，两人的关系早在留学法国时就开始了。但是，周恩来当时是留学生中间的领导人物，而最年轻的邓小平却是在周的领导下，搞“钢板”誊写稿件的工作。

问题是，文革期间被看作是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并上升为二号人物的林彪将军（党的副主席），在 1971 年 9 月企图叛逃国外，而在蒙古坠机死亡后的处理。当时还没公开发表的情况是，林彪向毛泽东要求当国家主席而没有得到允许，而且他对在“中苏对立”中，毛，周两人提出的对美接近政策也表示反对。他曾试图过谋反但又没成功，于是想逃到苏联去。为了打破这次事件后的难局，周恩来向毛泽东强烈要求重新起用邓小平。

1973 年 4 月 14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从柬埔寨解放区视察完后回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的欢迎宴会。会场上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低语声。我朝主宾席上的座位看去，陪同周恩来总理出席的不正是邓小平吗？在场的一位日本外务省报道局的人悄悄地告诉我，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重新出来工作了。

这是邓小平自文革初期遭到红卫兵的激烈批判，从 1966 年 12 月以后在公开场所没有露面以来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整整六年过去了。我也是打破常规，得到许可从人民大会堂直接向东京的总部汇报了这个消息。那也是前所未有的唯一一次。现在回想起来，这时候中国已经开始着手了纠正由于文革和林彪事件所带来的“后遗症”，以及挑选接班人的工作。这是周总理的病情被确诊后的第二年的事。

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的情况已在前面章节里进行了叙述。当时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及“四人帮”对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之间的牢固关系深感不快，他们进行了明枪暗斗。刚进入 1976 年，周总理去世后，邓小平也遭到被撤销一切职务的处分，由于毛泽东的指示只保留了“党籍”。但邓小平最终却好像一只不死鸟一样重新出现，并成为了继毛、周后中国最高的实权者。

如此看来，如果用中国传统表现的话，可以说周恩来是一位在革命的历程中扶持了毛泽东这位“皇帝”，在新的建设历程中引荐了邓小平这位也许是中国最后的“皇帝”的“大宰相”。不但如此，他还是一位不管是对上对下对左对右，对内对外，都要充分顾及对方的立场，竭诚尽意，以诚相待的，不可多得的伟大人物。

“雨中岚山”与邓颖超夫人

周恩来总理曾说过想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再去日本看看，遗憾的是他的愿望最终没能得以实现。但是在三年三个月后的 1979 年 4 月，邓颖超夫人来到日本，实现了周恩来的遗愿。我在那次十二天后的随行采访中，目睹了无数难以忘怀的场面。4 月 16 日是最令人激动的一天。

这一天在京都岚山的龟山公园举行了刻有已故周恩来总理的诗词石碑的揭幕仪式。周总理在青年时代从 1917 年到 1919 年曾在日本学习过。这期间还在京都呆过。石碑上刻的是一首题为“雨中岚山”的诗词。

诗词如下：

雨中岚山

日本京都

周恩来 1919年4月5日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娇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娇妍。

邓颖超女士致词，缅怀已故丈夫，并就这首诗作了说明。

“六十年前，青年周恩来在贵地看到的美丽的樱花遵循自然规则一起开放，又毫不留恋地散落而去，这幅景象对他探求世界真理有了一个很大的启发。这首诗就是把这种感铭寄托於岚山的景色而作的。”

接着，邓女士双手抚摸着飘落的樱花说道：

“我听说过樱花在盛开的时候很美，在飘落的时候更美。”

这话听起来让人联想到她的终身伴侣周总理伟大的一生。这位邓女士也於1993年与世长辞了。

正视历史

我当记者时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主要是在中国和东南亚一带。因此，每次回到日本时总有这样一种感觉。

那就是，当我从中国回来时，觉得日本人很象中国人；而从东南亚回来时，又觉得日本人很象东南亚人。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脸形，肤色，身材以及脚的形状等等这些外表上的东西。尽管看起来并不是完全一模一样，但能看到部分象中国人，部分象东南亚人的混合之处。

大概是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人们来到了日本。还有顺着黑潮从东南亚来到日本的人们。他们在这个岛国定居，交融繁衍，形成了今天的日本人。寻根问底，同种同源。

我茫然地抱着这种想法，正巧碰上一位说话风趣儿的人物。他就是已故的日本商会会头永野重雄先生。他说：

“日本人嘛，是（A + B）·。”

根据永野的说法，“ $(A + B) \cdot = A \cdot + 2 A B + B \cdot$ 。A表示从大陆来的分子，B则是顺着黑潮漂到日本列岛来的分子。A的资质和B的资质呈现出来的相乘效果，便形成了日本民族。”

共同的稻耕文化

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实的情况就会发现，日本与中国，日本与东南亚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

但是，日本与亚洲各国在根底部分却有着共同的文化，那就是以大米为主食的稻耕文化。

实际上，在中国各地和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不管你走到哪儿，都可以看到象是铺满了绿色地毯似的田园风光，还有那插秧，收割的场面。特别是在海南岛和印度尼西亚中部的爪哇所见到的插秧的场面，让人想起日本农村在实现机械化前时的同样的插秧场面，令人触景生情。

不管在哪儿，老百姓喜欢吃的是“炒饭”。汉语管这叫“炒饭”，泰语叫“烤粳”，印尼语叫“纳西锅冷”，韩国话则叫“波羹怕补”。

如此所述，日本和亚洲各国之间，不管是“人”、还是“文化”，都可以看出根子相同的东西。

佛教，儒教和汉字文化

但是，笼统地说亚洲，亚洲其实也是很广阔的。在之其中，隶属东亚的日本一直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在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具有深远悠久的历史，这也是很自然的。

历史上，日中两国之间开始了频繁的文化交流是始于七世纪到九世纪的隋唐时代。在这段期间里，为了学习中国优秀的律令和文化，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遣隋使和遣唐使。

唐代象征着日中文化交流的著名大前辈是鉴真和尚（688-763）。

为了传播中国的文物制度和佛教文化，他曾六次试图航海但每次都失败了。后来他不幸失明，但他还是在第七次时航海成功。鉴真和尚晚年在奈良创建了唐招提寺，为传播佛教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日本自古以来从中国吸取的知识财富当中，“佛教”和“汉字”的存在得在此特写一笔。佛教文化是日本政治和思想的巨大支柱，而且也是人们生活中得规范。汉字是日文必不可少的文字基础，后来日本人自己编创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也都是以汉字为原型的。

这一切都已是众所周知。仔细回顾历史，日本从中国那儿得到的恩惠真是无法计算。

从脱亚入欧到制霸东洋

但是，日本从江户时代末期开始，对经过产业革命后强大起来了的欧美各国的“炮舰外交”苦思焦虑。欧美列强强烈要求日本开放港口，缔结通商条约。国内让夷论者（主张与外国断交实行锁国，译者注）与开国论者之间的对立越来越激化。结果让夷论者失败，明治维新（1866）以后，日本模仿欧美采取了搞现代化政策。从那以来，日本开始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

但是中国正值清末时期，国力日益弱化。欧美列强早就盯上了中国大陆。从鸦片战争（1840~42）以

来，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奥地利等国先后掠夺了中国。模仿欧美各国开始步入现代化道路的日本也步那些国家的“后尘”，开始了对中国侵略的历史。

最初是“甲午战争”（1894年8月～95年3月）。结果日本以缔结“马关条约”占有了台湾，并把台湾作为自己的殖民地。那是距今一百多年以前的事。1910年8月，日本又占领了朝鲜半岛，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日本的野心越来越大。1931年9月18日的“满洲事变”后又挑起了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为导火线的“日中战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抑制压力后，日本军又在41年12月8日发起了“袭击珍珠湾”事件，对美英等国开始宣战。以此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称之为大东亚战争），战火蔓延到东南亚全地区。

小时候，我们受到的教育是，这一连的战争都是“圣战”，是建立在“八紘一宇”和“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上的。但是从中国以及亚洲的广大人们眼里看来，所谓“圣战”的实质，无非是日本制霸东洋的野心。而且，由于搞“霸权主义”，日本也遭到引火自焚的下场。

日本吸取历史教训不够

但是很多日本人认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受害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炸弹，死亡人数极大，同时还留下了随时都可能死亡的后遗症。为此，日本人强烈呼吁“反对第三次原子弹”，这也是日本战败后的“反战·和平运动”的原动力。

但是，令人感到悲痛的是，在日本人中间，缺少对在原子弹投下前日本对亚洲长时间的侵略战争那些罪行的深深反省。我们不得不说，日本对自己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同时又一直是对亚洲人民的“加害者”这一点的历史认识，还是很不够的。

战后，日本人在不再战的和平宪法下，从一片废墟中站起来，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里，有日本人的勤劳和自明治维新前后开始的现代化教育所起到的无形的巨大作用。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所具有的优秀品质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同时也不能忘记，在战后的自由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冷战体制之下，日本是在美国核保护伞下得到安全保障的，而且，在亚洲爆发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由于美国巨额的“特别军需”才使得日本的经济得到了复兴和成长。亚洲一些年轻人和知识界人士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痛斥战后日本所走过的历程是用“经济侵略”来代替了“军事侵略”，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

日中关系之间巨大的“虚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根据以美苏为主的战胜国的处理，日本归属美国的占领和管理之下，德国则分为东西两部分，而朝鲜半岛也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分割为南北朝鲜。在中国大陆，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一度合作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从1946年7月又开始了第三次内

战。

当时的中国（中华民国）是由国民党掌握政权的。但是在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同时，从很早以前就一直强烈反对国内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吸引了广大的劳苦大众，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内战中战败的国民党政权逃离中国本土，打着照旧没变的“中华民国”的旗帜，把首都移到了台北。

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同年9月为了支援南部的韩国，联合国派出了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部队。10月他们攻破了三八线北上，直迫到了中国国境线上。对此，中国在11月表示支持北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并派遣志愿军部队，以人海战术与联合国部队进行对抗。

在此之前，在中国内战趋势已呈明显化的1949年8月，美国曾公开发表了“中国白皮书”，指出国民党政权是由于自身腐败才战败的，并表示以后即使是共产党军队攻打台湾，他们也“不介入”。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却打出了以台湾海峡水域为中立化的政策，而且还进一步把美军第七舰队派到了该水域（这一动向对当时“美中关系”就台湾海峡与朝鲜战争之间的关联极为重要，关于这一点在后面将作详细叙述）。

另一方面，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后，把日本作为了自己最大的后方基地。51年9月在旧金山签订了对日讲和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于是日本从此就成了美国核保护伞下的一员。

就是在这个大框架里，日本在52年4月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即中华民国政府）缔结了“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尽管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但日本却在此条约中承认在中国大陆既没有土地也没有人民的“中华民国”为代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且宣称了“日中战争”的终结。

日中关系之间的巨大的“虚构”就是这样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行径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从那以后还多次反复声明“与日本之间的战争状态并没有终结”。

朝鲜战争在1953年7月27日达成的休战协定生效时总算暂时画上了句号。但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冷战体制仍在继续，在远东地区，美国的“封锁中国的政策”也愈加强化。53年美韩相互防卫条约，54年3月日美相互防卫援助条约（MSA），同年12月美台相互防卫条约先后缔结。从此以后，日本政府就等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美国，尽管遭到了国内以及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各种反对，但日本还是一意孤行地执行“对美追随外交”。

朝鲜战争是悲剧的起点

追踪战后的美中关系

1966年春天我正作为东京总社国外通讯部的成员，主要是对中国问题以及越南战争的去向进行追踪报道。当时的国外通讯部部长秦正流（后为常务董事，已故）要我“总结一下战后三十年的美中关系”。时间只有三个月，我便在研究室着手准备。

当时美国约翰逊政权的“轰炸北越”逐渐升级，越南后方的中国也不断对美进行严厉谴责。在报社内部，不少人都担心，“今后的中美关系将会怎样？”

我首先收集了报社内外有关中美关系的资料，一边阅读美中双方的政府声明、外交文件、专家的分析文章等，一边仔细地整理事实关系。有时还从当时的社论主编森恭三（已故）和精通欧美关系的社论副主编宫地健次郎那儿得到指教，终于把文章写好了。在此期间，平时学习不够的笔者，还有了几个“新发现”。

其中最大的发现是从美国国务卿阿基逊公开发表的“中国白皮书”（1949年8月5日）到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6月25日）这段时间的美国对华政策。在这里列举这段时间前后的几个要点，仅供参考。

美国曾宣布“不干涉内政”

美国外交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将要在两个月后（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同年8月5日发表了“中国白皮书”，在白皮书中记述道，“国民政府自毁于腐败……我们的支援白费了。”

同年12月23日，外交部对驻外公馆下达了意为“台湾即使是落到中共（中国）手里，我们也不介入国共内战”的“秘密备忘录”。

美国的这种态度在第二年即50年1月5日的杜鲁门总统声明中也得到确认。总统在声明中指出，基于开罗宣言（1943年12月1日）和波斯坦宣言（45年7月26日），美国在此确认“把台湾归还给中国”，同时公开表明“美国政府将不干涉中国内政。”

而且，这种对中国的基本态度在美国的远东地区“防卫线”上也表现了出来。

50年1月11日，美国国务卿阿基逊在上下两院外交委员会上证言说：“即使是失去了台湾，美国在横穿日本、冲绳、菲律宾的基地已形成了不可攻破的防卫线。”这个“防卫线”并没包括韩国和台湾，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朝鲜战争使得态度一百八十度大改变

但是，美国的这种对华政策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50年6月25日）而完全改变了。杜鲁门总统在6月27日发表声明，“命令第七舰队注视中共对台湾的攻击，同时要求中国大陆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来自空中和海上的攻击。”他进一步指出，“台湾将来的地位必须待到太平洋恢复了安全、对日讲和条约得以缔结以及联合国的仲裁才能决定。”

美国从此开始了对中国问题的介入。第二年即51年5月1日美国向台湾国民党政府派遣了军事顾问团。

就在杜鲁门总统发表这个声明的第二天及2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严厉指出，“杜鲁门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是对中国领土彻头彻尾的武力侵略，是‘彻底违反国际联合宪章的行为’。”并发表了如下的严正声明。

“美帝国主义不管进行什么样的阻碍行为也永远改变不了台湾是属于中国的这个事实。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开罗宣言、波斯坦宣言以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的。我们全国人民将万众一心，为从美

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但是到了艾森豪尔和达雷斯时代，美国的对华政策则越发强硬。艾森豪尔总统在 53 年 2 月 2 日的总统咨文中指出：“命令第七舰队停止至今为止的对中共（中国）只起抵抗的作用，”暗示美国介入台湾将更进一步。54 年夏天，中国表明了要解放台湾的意思，并开始了向沿海诸岛的炮击，美国也在 54 年 12 月 2 日与国民党政府签定了“相互安全保障条约”，并正式结成了同盟关系。

对此，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同年 12 月 8 日，发表了如下的严正声明。

“美蒋所缔结的所谓‘相互安全保障条约’，是完全不合法并无效的。这是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条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如果美国政府不从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非要干涉中国内政的话，美国政府必须对由此所产生的一切重大后果承担一切责任。”

自杜鲁门、阿基逊时代曾采取的不介入台湾的政策被改变以来，美中两国之间的基本对立从没消除过，而且从那以后也一直持续着。

从以上的推移可以明显看到，美国政府从“中国白皮书”的公开发表到“朝鲜战争爆发”这一短短的时间里，对新生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用真诚的态度对待过。也就是说，①基于“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宣言”曾再次确认过“把台湾归还给中国”；②曾公开表示过“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态度。

从“和平宪法”到“日美安保”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日本战败后的对日政策与其对华政策的推移竟是如此的相同。

在战后不久的 1945 年 10 月 25 日，日本政府成立了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但是围绕着“天皇制”的处理，意见没法统一，使得宪法的制定工作面临难局。为此，当时美占领军的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在第二年即 46 年 2 月 3 日指示 GHQ 负责宪法草案的制定，并积极参与了象日本不再进行轻率无谋的战争行为等那样的宪法主要部分的制定工作。

结果，新宪法在同年 11 月 3 日公布，从 47 年 5 月 3 日开始实行。新宪法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天皇只作为象征存在，提倡“国民主权”和“基本人权”，同时在第九条中还提出了“放弃战争”、“否定交战权”以及“不保持战斗能力”等彻底的和平主义，后来有人批判此宪法是“强制宪法”，但在制定的当时在大众之间是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欢迎的。漫长的战争给整个国家带来的疲惫，特别是日本人经历了战争的最终时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所造成的体无完肤的那种战争的悲惨景象，他们对发誓不再战的和平宪法从心底里表示了赞成。

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的这种态度也起了根本性的变化。51 年 8 月 10 日让日本成立了警察预备队，51 年 9 月 8 日签订了对日讲和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进而在 54 年 7 月 1 日又让日本成立了自卫队和防卫厅，这些都是与制定“和平宪法”的当时是背道而驰的。

为此，舆论也逐渐分裂多样，而且还出现了在野党，比政府和执政党还要极力拥护本是支撑国家体制重要部分的宪法这一怪现象。在日本国民之间，一方面有人支持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另一方面由于“朝

鲜战争特别军需”，而对战后经济复兴更关心的倾向却日益强烈。

同时，有一点要记住的是，由于美国占领军的态度改变，日本成了朝鲜战争以及“封锁中国政策”的后方基地。为此，日本民族对过去的侵略战争的反省变成半途而废，对历史的认识也变得淡薄而且暧昧，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

如上所述，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后的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就是以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境界而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的。

笔者还想在这儿提一件极为令人遗憾的事。据笔者所知，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既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关于这一点许多专家的意见也是一样的。

前面也已提到过，有关美国动向的推移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1月11日阿基逊国务长官在上下两院外交委员会上的证言中提到，美国远东地区的防卫线不包括韩国和台湾。另外，当时中国把“解放台湾”作为最大的任务，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也已陆续南下，在台湾对岸的福建省以及周围地区集结了大量部队。正当中美关系在尽管非常短的时间里，已显示出从敌对关系向非敌对关系摸索转变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于是这个转变被带到了一发而不可挽回的不幸状态。

身背“包袱”的日本

不管怎么说，这场朝鲜战争毫无疑问地是在战后形成亚太地区冷战体制的重大而令人悔恨的起点。

在这期间，日本民族又一次背上了“历史的包袱”。我用“包袱”这个词有以下两个理由。

第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后还不到五年，接着就爆发了朝鲜战争，所以对自己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在中国、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所犯下的侵略行为的历史教训没能从根本上得到认识，政府和国民对历史认识都不了了之。

第二，虽然日本战败后马上被美军占领，这可以说是一个原因，但日本作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出发点刚刚制定了和平宪法，却又被日美安保条约捆住了手脚。这使得日本与曾经侵略过的中国以及一些亚洲国家再次处于敌对关系。

为此，自那以后，每当与日本产生任何形式的“摩擦”时，中国，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就会打出“历史招牌”，而美国则打出“安保招牌”，令日本左右为难。在中国看来，日本不但存在着“历史认识问题”，而且“台湾问题”也会时常冒出来。

要冷静地分析日本现在所处的立场，那就需要看看日美关系的过去。战后在曾一时很盛行的“反战和平运动”中，当日本的年轻人和左派的勇士们高声呼吁“不要第二个广岛”，“反对日美安保”时，从太平洋对岸就返回来了“勿忘珍珠港”。这是指日本军在1941年12月8日袭击珍珠港，向英美宣战以至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个事件。意思是说，日本对曾经向自己“侵略中国”施加过压力的美英两国先发制人，挑起战争，并把战火烧到了东南亚这一事实背有历史包袱。

曲折复杂的日美中三角关系

美国的对华、对日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苏为顶峰的冷战体制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苏联的解体，美国便成了地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进入九十年代后，美国国内的经济很景气，最近甚至有人说现在是“美国独占天下”。

不错，美国是一个年轻、强大并具有清晰头脑的国家。但是应该指出，它也有视自己为“全能的存在”，搞“本位主义”的倾向。

以前，记得在我访问美国时，在“美国是如何看待日本的？”这个问题上，曾有过令我吃惊的回忆。那是在拜访斯坦福大学著名的军事战略专家汉福利教授时。

教授给人一种很精悍的感觉，他说他的研究小组最大的课题是“五年乃至十年后的中国与日本”。乍一听，也许可以说是这个课题是重视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地位，但我却清楚的感觉到了，他们研究的重点是在中美关系这个“大局”之中，美国将如何不失时机地向日本要求其发挥怎样的“作用”。说明白了，日本只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卒子”。

从越南撤军与对华接近

1967年秋天正值美国约翰逊政权的“北越轰炸”不断升级。同时，在越南后方的中国大陆，一边面临着严峻的中苏对立，一边在国内大搞文化大革命，人民解放军的作用增大，正是一派斗志昂扬的景象。在这种局势下，汉福利教授所研究的课题让人感到既重大又敏感。

美国是希望日本在“封锁中国”的计划中起作用呢，还是希望日本起一个“美中两国之间的桥梁”作用呢？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老实说，我当时的心情是这样的。我对汉福利教授说，①美国应尽早结束轰炸北越；②日本与美国有着同盟关系，但同时同中国在历史上和文化上有着悠久深厚的关系；③美中冲突应极力避免，朝着建立日美中三国之间的良好关系的方向努力。

在谈话中，我得知汉福利教授在战后曾作为一名军事要员在日本呆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对日本人的那种美国人所没有的、对中国人的特别感情表示非常理解，这使我反而松了一口气。

就在我结束了两个半月左右的美英访问后的第二年，即1968年，约翰逊总统承认了自己的轰炸北越政策的失败，并宣布不参加下届总统的竞选。新上任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与打开对华关系的主要人物基辛格国务卿等，在汉福利教授的课题“五年后”的1972年2月，实现了美国总统历史上的第一次访华。

“尼克松震惊”震动了日本

那次访华决定作为“绝密行动”走到了具有“同盟关系”的日本政府前头，因此被称为“尼克松震惊”。这件事震撼了日本全国，使得长期以来对华改善采取消极态度的佐藤政权不得不下台。同年9月29日，

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先美中关系一步，实现了划时代的“日中邦交正常化”。

在我拜访了汉福利教授“十一年后”的1978年8月12日，签定了表明日中两国子子孙孙世代和平友好下去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负责签字的邓小平也访问了日本，并定于同年10月23日此条约开始生效。几乎象是紧追不舍一样，美中两国在同年12月16日正式发表了将在79年1月1日实现“美中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

进行“五年和十年后的中国与日本”这一重大课题研究的汉福利教授得出了什么样的“答案”不得而知，但是美国的研究工作者，以实际经历为基础，以战略的观点来考虑局势的发展，着力于长期视野研究的这种精神，使我受益匪浅。

这个时期的美国、中国和日本三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各自的立场和利害关系，达到了基本上一致的程度。

日美中进入“蜜月时代”

也就是说，尼克松政权在上台当初就决定了①从越南撤军；②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作为世界战略的重要课题，并在严峻的“中苏对峙”中，选择了“中国”这张牌。而且对拥有“同盟关系”的日本，也明确显示了赞同日本推进对华关系。

中国也清楚意识到了美国要从越南进行战略性的撤退，在由于珍宝岛的武力冲突与苏联处于进退维谷的状态中，中国选择了与美国和解的道路。中国对日本新政权的对华改善行为表示了积极的态度，毛主席和周总理在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一行访华时给予了最高级别的欢迎。

对日本来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不是单单的强大政策的表示，而是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其重大意义在于，曾侵略过中国的日本，作为一个战后民族的课题，完成了它最大也是最终的“战后处理”。同时，日本政府在这时也开始承认“台湾问题”是“根本上的中国内政问题”。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在严峻的“中苏对峙”的局面下，在对美和对日关系上表示了容忍“日美安保”的态度。对日本来说，从过去自己负有的“历史重负”的观点上来看，这个时期是比较安定的，中国也没打出“历史招牌”，美国也没打出“安保招牌”。

在日美中三国之间的关系向前发展时，相反由于中苏对立和中越对峙，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却越来越大。但是，广范围的亚太地区的相互关系还是出现了新的展望。

天安门事件使得风云突变

但是“福”持续得太长，总是会出现新的“祸”。

经过“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美中建立外交关系”（79年1月1日）等，发展顺利的美中关系突然风云激变，起因是那场“天安门事件”（89年6月4日）。美国率先于日本及西方先进各国实行了严厉的“对华制裁”。92年美国选举上台的第一期克林顿政权就是把打着“人权”和“民主化”的牌子

来批判中国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中心的。

中国方面则批判美国的作法是“干涉内政”。在这儿我想引用一下“天安门事件”后，说出中国人“心里话”的实权者邓小平的一段话。

“如果真让那些所谓的民主勇士们掌了权的话，马上就会出现内乱。一旦内战爆发，国土将会是血流成河，还能谈什么‘人权’？诸侯割据、生产倒退、交通瘫痪、百万、千万、甚至是上亿的难民将逃往海外。受其直接影响的将是亚太地区，这将是世界性的灾难。”

“因此，中国不能自己制造混乱。当然这不光是中国要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说什么人权对立、搞民主啦，这些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要本着和平五项原则、和平共处、相互合作，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也不要去煽动别国的内乱。”

围绕着台湾总统选举的美中对峙

美中关系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后又出现了 95 年 6 月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的问题，96 年 3 月正值台湾总统选举期间，中国进行了导弹演习，为此美国则派遣航空母舰进行对抗。这一连动向的背后，有着以下的经纬。

1988 年蒋经国总统死后李登辉为后任总统，他提出“朝着以三民主义来统一中国的大业奋勇迈进。”对此，中国领导层表示了“欢迎之意”，他们一直注意观察李登辉的言行，从 94 年春天以后，他们越来越怀疑实际上在搞独立派。因此中国对李登辉访美表示了强烈反对，再加上美国议会等方面的强大压力，克林顿政权就让在“民主”、“人权”方面有着同样价值观的李总统以“私人访问”的形式进入了美国。

据北京的报道说，当时在中国领导层内部已一致同意把李登辉总统称为“独立派”。从那以来就用“隐蔽的独立派”、“企图搞独立”等来批判李登辉。96 年 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总统选举期间向台湾近海发射了导弹，表示了要防止“台湾独立”的决心。同时也意味着对美国等国家的警告。中国反复声明“不放弃行使武力”，这并不是说说吓话，外国如果插手台湾的话，（钱其琛副总理）说过“海峡必将大乱”。

对此，克林顿总统指示向台湾近海派遣航空母舰。这样做有两层意思。第一，让中国方面正确领会一下“美国的重大决意”；第二，让对中国发难的美国议会看到自己的“强硬的态度”。美国议会的不满，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是违反 1979 年制定的“台湾关系法”（美国国内法）里明确记载的“台湾的将来用和平的手段来决定”这一条款的。此法是在“一个中国”这一大前提下制定的，此法指出，如果使用“和平手段以外”的方法的话，则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定的威胁”，美国政府有必要采取强硬的态度。

“对话之线”没断，关系有所好转

一般人都认为，围绕着台湾海峡美中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使得这种关系自“尼克松访华”以来进入了

最恶化的状态。但是美中双方都没有完全断掉“对话之线”，后来在美国国家安全保障担当辅佐官的雷克以及中国方面的刘华秋国务院外务办公室主任等的努力之下，两国关系慢慢朝着缓和的方向移动了。

随着克林顿开始连任第二期总统（96年11月5日），两国关系的缓和更加具体化。主要有美中首脑的互访计划以及对中国的“包括性参与政策”等。美国方面没有表现出象以前冷战时期那样，要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意图。

在同年11月24日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就在马尼拉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际，进行了会谈，并就美中最高首脑互访达成了一致。同年12月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访问美国，9日与克林顿总统和贝利国防部长进行了会见。迟部长是军队的最高实权者，也是镇压“天安门事件”的负责人。为此，在事件发生前已经订出了访美计划，但被取消，尔后又一拖再拖。

在与美国最高首脑会谈时，迟浩田国防部长强调了要保留用武力解放台湾的权利，美国应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等中国的基本立场。这次访问后，美中之间的军事有关人员又进行了多次不同级别的互访。

这儿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海军的三艘军舰（导弹与驱逐舰“哈尔滨”和“珠海”，一只补给舰）在97年3月21日途径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湾、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美国海军基地，并停留了5天。中国军舰驶进美国本土的港口，是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美国海军士兵和一般市民约一千人到码头欢迎了中国的约六百名水兵。中国的舰长（王永国中将）在致词中强调“中美两国在太平洋上是团结一致的”。这个场面实在是无法让人相信就在一年前美国由于台湾海峡危机曾派遣过两艘美国航空母舰，使得人们还紧张了好一阵。

朝鲜半岛的和平也需美中合作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是，与“台湾海峡”同时，围绕着远东地区另一个纠纷之地“朝鲜半岛”的动向。就在台湾近海美中之间的军事对峙趋于安定的96年4月1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与韩国总统金泳三进行了会谈。会谈提议战争当事者进行“四国会谈”以制定永恒持久的和平体制来代替那不安定的朝鲜战争休战协定（1995年7月27日）。这四国当然是指韩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美国以及中国。北朝鲜在同年11月接受了此协议，第二年即97年7月初中国也正式表明参加四国会谈。同年8月在纽约举行了由南北朝鲜和美中参加的会谈预备协议。

这一连的动向明确显示了，缓和以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为主的紧张、保障远东地区的安全问题，是在美中两国参与后才开始有进展的。而且，美国如果要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就不可缺少的要与联合国安常任理事国的中国进行合作。进一步说的话，世界已经进入了自冷战体制崩溃后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与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约十三亿人口，比美国多十亿多），在广范围的领域里一定要认真进行对话的一个新时代。

克服两个历史“包袱”

日本的存亡与对美和对华关系

日美中三国之间的关系，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约十八年的时间内，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摩擦”，但在大局上是安定良好的。但是经过了“天安门事件”（1989年6月）和“台湾海峡的对峙”（1996年3月）以后，现在美中两国将要成为“建设性的战略伙伴”，那么日本所处的地位明显就要不同。迄今为止一直是日美对中国这种关系图。这种状况到底好不好？一直重视日美关系和日中关系的日本民族正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和使命，那就是要紧紧掌握与美中两国所建立起来的基础，克服现在这种两面受夹的状态，朝着新的二十一世纪，用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创造出与他人的共存之路。

日本经历了“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惨痛失败，可在二十世纪后半的“战后五十年”里，国家的命运几乎完全是由美国掌握的。即使是在压倒多数的日本人所希求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1972年9月）以及后来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78年8月）的缔结的时候，也无一例外。可以说那个“尼克松震惊”促使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就连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交涉，由于苏联的极力反对而陷于难局，最终也是在日美首脑会谈时卡特总统给了“上方宝剑”后才得以缔结的。

但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与顺应潮流的“强权游戏”不一样，在其根底里有着超越时间、一定成功的“人间之道”。这里面包含了日本民族对自己从十九世纪来到二十世纪前叶一直侵略中国和“侵略五十年”进行赎罪的那种“历史认识”。同时，也是衷心希望由此能使两国之间两千年的民族深厚感情重新恢复起来，并能世代友好下去。中国的领导人和人民也感到了就是在这点上的特别的意义。

由此可以看到日本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对于日本民族的存亡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日本现在紧迫的课题是，在美中两国正在朝着确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扩大合作关系的今天，日本要紧紧抓好与美中两国之间的“友好纽带”。在战后“远东”所走过的历史中，与“台湾海峡”同样成为两大纠纷之地的“朝鲜半岛”，现在也在酝酿着朝着和平方向发展的“四国会谈”。

正视日中与美中的不同

日本现在正面临着这样一个时机：正确认识远东局势的大潮流，与至今为止的“暧昧”作法诀别，明确主张自己的立场。只有通过自己的决断和实践，才能克服先后从二十世纪前叶和后叶开始一直身背的那两个“历史重负”，迎接新的二十一世纪的到来。

为此，我想把这两、三年来的日美中关系的推移按照时间整理一下。

围绕着台湾海峡的动向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是在1996年3月。在台湾进行直接选举总统活动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台湾近海发射了导弹，表示了要阻止“台湾独立”的决心。对此，美国方面派遣了航空母舰以牵制中国方面的行动。

日美两国政府签定的“日美安保共同宣言”就是在紧接这以后的同年4月17日发表的。在此基础上，马上又开始了重新修改日美防卫协力的工作。刚刚经历过“台湾近海对峙”的美国方面坚持“新防卫线的

本质，是已把韩国和台湾条款写了进去的 1969 年制定的日美共同宣言的回归”（美国防总部认为），把朝鲜半岛和台湾作为焦点，对此，日本政府则称其为“某种意义上的对应朝鲜半岛事态的临时措施法案”，就新提出的“周边事态”这一点，也一直是含糊不清地答辩为“不是指地理上的概念。”这是日本想在台湾问题上，继续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同时又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所使用的“苦肉计”。但是扪心自问，这实际上是“掩耳盗铃”。

但是，美中两国在台湾海峡的紧张气氛平息下去以后，两国马上就不断有着高层次的外交接触，八个月后的 96 年 11 月，随着第二期克林顿政权的开始，一些为改善关系的具体措施得以采取。同月 24 日，克林顿总统与江泽民主席在马尼拉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并就尽早实现美中最高首脑的互访达成了一致。

从那次会谈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即 97 年 10 月下旬，就实现了江泽民主席的第一次访美。而且那次访美是在中国在那段时间里战胜了“实权者邓小平去世”（2 月 19 日）、“香港的主权回归”（7 月 1 日）、“第十五届党大会”（9 月）等几个世界关注的“重大考验”，并取得了成果的情况下进行的。由此克林顿总统在 98 年 6 月下旬带领一支超大型的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访问，并走到日本前头，决定与中国定期举行“建设性战略伙伴”的谈话。

在这段时间里，日本由于忙于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事情，对美中两国之间的急速的关系改善动向，竟完全没有顾及到。而且在磨磨蹭蹭之际，一方面就“周边事态”遭到了来自中国的“明确指出台湾不在该地区范围之内”的严厉批判，另一方面，还没让发挥一下民族的尊严和独立性，就让冲绳连同全日本都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展开、支援美军发动进攻的基地。象这样的国家，这个地球上哪儿还能找得到？日本与美国有着同盟关系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同时，与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上和经济上有着广泛深厚关系的日本，现在应该趁美中两国正在进行“大的对话”时机，明确指出美中关系与美日关系的不同之处。特别是在围绕着重新修改指南时成为最大焦点的“周边事态”的“台湾问题的处理”这一点上，有必要态度鲜明。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台湾关系法”

首先，读一下中美两国对“台湾问题”的基本态度。

1997 年 10 月下旬中国江泽民主席第一次正式访问了美国，并与克林顿总统进行了“包括性的谈判”。顾名思义协议涉及多方面，但中心的课题是“台湾”和“人权”。在同月 29 日发表的美中共同声明中指出“两国首脑一致认为，意见一致与分歧的领域都有，”“在人权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

关于“台湾”，此声明明确指出，“中国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微妙的问题。美国再次确认了，要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以及中美签定的‘三个声明’中所制定的原则。”

这里的“三个声明”是指①1972 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发表的美中共同声明（上海声明）；②79 年建立外交关系时的声明（发表于 78 年）；③82 年有关台湾问题的声明。在结束中美两国敌对关系的“上海声明”

中明确表明了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的等和平五项原则和反对霸权。在“建立外交关系声明”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与台湾只保持非正式关系。在“台湾问题声明”中则明确指出了，在前两项声明的原则前提下，美国将逐渐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一定时间后将完全停止。

两国首脑在会谈结束后的 29 日，举行了共同会见，就台湾问题，各自态度的要旨如下。

江泽民主席：“已故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用一国两制来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这是和平统一中国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但是，我们不放弃行使武力的权利。这不是直接针对着台湾同胞的，而是针对着那些想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搞台湾独立的外部势力。”

克林顿总统说：“我们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保持与台湾和中国人民友好关系。但是，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是和平的。这关系到亚洲的安定与繁荣。近些年中台之间的投资和接触越来越大。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据来自华盛顿的报道，有一点没写进美中会谈后的共同声明，据说那就是台湾问题中国方面从美国方面得到了三不支持的许诺，即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简单说，美中双方在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和统一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是中国认为来自外部势力（主要指美国）的武力干涉内政这个障碍的存在，为此自己要保留行使武力的权利。

对此，美国方面的立场是，和平解决是第一位，如果中国采取其它方法的话，美国也将会采取相应的方法。美国的这个意图在 1979 年 1 月 1 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当时来自议会的压力也很大，就制定了“台湾关系法”，并以此为武器来对付中国的行使武力。1996 年 3 月由于中国军队向台湾近海发射导弹而派遣航空母舰，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但是，美国国内的舆论以压倒多数的优势表明反对“台湾问题”成为美中之间直接武力冲突的原因，在这点上，“台湾关系法”仍残留着“战略性的暧昧”。

日中关系正常化与和平友好条约

在这点上，日中关系与美中关系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政治基础是 1972 年 9 月日中邦交正常化时签定的日中共同声明，以及 78 年 8 月签定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里的各项原则。

日中共同声明的正文“第二项”里，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第三项”里中国表明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对此立场表示十分理解和尊重。在签字仪式以后，大平外相在会见国内外记者时说：“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我们认为‘日华和平条约’（日台条约）已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已经完结了。”

另外，在日中共同声明正文“第六项”里，日中两国确认了在和平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不诉讼武力来解决纠纷，在“第七项”里提出了两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而且也反对任何国家的霸权行为。这“第六项”和“第七项”也写进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正文里。

在缔结日中邦交正常化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时，先后负责谈判的大平外相和园田外相在国会答辩中明确表明“台湾问题从根本上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从那以后，日本政府把台湾从日美安保条约适用的对象

地区排除了出去。日本在实现对中邦交正常化时，与在国内制定了“台湾关系法”的美国，立场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有必要加以确认。

围绕着新防卫线中出现的“周边事态”这一说法，日本政府当局内部也是意见纷纷，难以统一。但是，起主导作用的美国方面却坚持，“新防卫线的本质是已把韩国和台湾条款写了进去的 1969 年制定的日美共同宣言的回归”（美国国防部的认为），要求把朝鲜半岛和台湾包括进去。但是，美国的这种见解意味着这是跨越 1969 年以后才实现的日中邦交正常化（72 年 9 月）以及日中和平友好条约（78 年 8 月）的一种倒退现象，是与日中两国政府间的“台湾问题从根本上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一政治誓约水火不相容的。因此，日本政府应该本着诚意和责任明确表明“不包括台湾”，曾说过的“周边事态不是地理上的概念”那种无奈托辞，这时候应该改过来。我认为这也是日本民族要保持对美中两国真正“友好纽带”关系的风度。

美中步伐慢慢靠拢

但是局势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今后美中两国之间交涉的动向一定得全神贯注地注视。所谓的“包括性交涉”，其实范围是极广的。特别是都说“台湾”、“人权”是很重要的，实际上不光光是这些。象建立朝鲜半岛的永恒和平结构、核武器管理和核扩散防止问题、以及遍及亚洲全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处理等等，这些都需要美中的合作。

同时，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在美中两国之间有着“很大差异”的“人权问题”上，出现了实权者邓小平在世时没想到的现象。众所周知，美中最高首脑在华盛顿会谈后，中国方面在 97 年 11 月中旬以“生病疗养”的名义释放了被称为民主化运动象征性存在的魏京生。98 年 4 月对天安门事件的领导人之一的王丹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而且，中国方面还表示要在“关于市民和政治权利的国际规约”（国际人权 B 规约）上签字。这些都被认为是中国方面朝着“建设性的战略伙伴”所作出的“让步”。

另外，在被称为美中之间最重要和最微妙问题的“台湾问题”上，美国方面也出现了修改政策的兆头，这点儿也很值得注意。而且，意味深长的是，被称为是克林顿第一期政权时期拥有“台湾近海的美中对峙”的经历，后又制定日美安保共同宣言，并在此基础上策划“新防卫线”的理论支柱的前国防次官约瑟夫·赖（现哈佛大学教授）等人，与当时的美国防总部的一些高级干部正在进行调查摸索工作。

这些干部中有前国防部长贝利、原总理辅佐官斯科库夫特和前统合参谋本部议长夏利卡索比利等人。据报道这三位在 98 年 1 月访问北京时与江泽民主席进行会谈后，又去台湾与李登辉总统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他们提到，“美国对台湾的保护是有限的。”随着美中之间在广泛范围的对话逐渐加深，台湾最“可信赖之网”的美国也开始感到不能让“台湾问题”搞坏了中美关系，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

引人注目的赖氏新论文

在这期间一件令人注目的事情是，前面提到的约瑟夫·赖氏 98 年 3 月 8 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台湾政策”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要旨是建议美国修改台湾政策，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只要台湾不搞独立就不行使武力。换句话说，如果搞独立就要行使武力。这样的话，美国就应该让台湾放弃独立，同时明确表示美国本身也不行使武力。而且，在维持现状中，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将更加加深，这也会促进政治对话。美国应该在台湾不独立这个前提下，在“一个中国”这个大框架中帮助台湾扩大国际空间。

日本的媒体也转载了这篇文章，《每日新闻》5日与19日晨报上刊登的一篇题为“安保”深海流②“注视台湾 2000 年的危机、赖氏变身”的文章，加上对赖氏本人采访，耐人寻味。在此，请允许引用其中一段。

——可以被称为“战略性暧昧”元祖的赖氏提出了“扔掉暧昧”。即“让台湾宣布放弃独立，美国明确表明不行使武力。”这是为什么？为此我们采访了现已回到旧巢哈佛大学并担任肯尼迪行政学院院长的赖氏。

“我在政府工作时，也顺从了不要对台湾政策讲得太详细、太清楚的公式见解。后来在与同事和朋友议论中，想法改变了。因为台湾国内的政治也变了。2000年在总统选举中如果在野党（民进党）取胜后搞独立的话，就会产生危机。有必要为那时作好准备。”

1996年3月，正当台湾第一次进行直接选举总统时，中国在台湾近海进行了导弹演习，美国派出航空母舰，使得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总统选举的结果是国民党的李登辉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取胜，但在第二年即97年11月的台湾地方选举中，打着“独立”旗号的在野党民进党一举跃进超过国民党。2000年根据可靠消息，赖氏在今年1月访问台湾时，除了李登辉以外，还与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当时）、台北市市长陈水扁等进行了会谈。据说他当时叮嘱道：“如果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支援是一张白纸支票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第一期克林顿政权时期曾任赖氏上司的贝利前国防部长等人的北京以及台北的访问，就是紧接这以后进行的。接后，贝利和赖氏两人2月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菲进行了会见并交换了意见。那篇投给华盛顿邮报的文章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

中台双方也出现微妙的变化

随着美台之间不断发生的变化，中国方面的“台湾政策”也似乎有了微妙的修正。

香港的一家报纸《南方中国晨报》在98年4月29日报道说，据来自对北京的台湾政策很详细的情报，“中国的江泽民主席在6月的美中首脑会谈后，表示希望美国能向台湾派去特使，就围绕着台湾问题出现的新的美中协调关系进行说明。”报道还说，“这样做的背景是中国希望通过与美国加强关系，借助于美国的力量，使中台对话能进展顺利。”来自北京报道中也表明了当局这样的意向，即“与美国合作应该是可以用于台湾问题的。”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5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停止了八年后又召开了“对台工作会议”，以协议促进中台对话之事。令人注目的是，从那以后，据从已公开的情报中得知，江主席指出，“一定要深刻理解

台湾人民的心情，充分考虑和尊重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就台湾内情，中国开始表现出从未有过的顾及对方的柔软态度。

据笔者所见，台湾在 2000 年的总统选举中即使民进党取胜了，也不会搞什么“独立宣言”。这不但是国民党，连民进党的有权人士以及广大的支持者也是这么说的。大陆方面只要民进党不搞“独立宣言”，一定会花时间去努力寻找对话和交流之路。因为，江主席已经公开表示过，只要没有外部的干涉，中国“将深刻理解台湾人民的心情，充分考虑和尊重他们的利益和愿望。”

另外，在克林顿总统访华前，被称为中台交流窗口的台湾协会（会长汪道涵）之间的交流很频繁。辜振甫理事长的访华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台湾总统府的苏起副秘书长说，如果辜氏访华能实现的话，双方一定会商议李登辉访华之事。

远东局势的变化与日本的进路

如果正视一下问题的话，当今的台湾问题则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刻采取了介入政策，才使得其走过如此复杂的过程。1995 年李登辉总统的访美，以及接后发生在第二年 3 月的“台湾海峡的美中对峙”，对美国当局来说都是极大的负担。

为克服这些危机，克林顿总统在去年秋天在华盛顿召开的美中首脑会谈中，向江泽民主席口头上表明了“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台湾进入联合国”等都“不支持”。这里含有美国不愿意由于台湾问题而动摇对华关系的苦衷。而中国，一方面对这个口头表明予以高度评价，一方面强烈要求把这“三不支持”文章化，以避免“暧昧性”。今年 6 月克林顿总统访华时，想必这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焦点吧。

据报道，随着美中之间“大的对话”不断加深，不但象美国前国防部长贝利以及前国防次官赖氏等这些克林顿第一期政权时代的国防部的主要干部的意见，就象“不能让台湾问题搞坏美中关系。美中双方应重视共同的利益，”（哈佛大学教授爱斯拉·波格鲁）这样的意见，在美国学术界也越来越得到支持。

令人遗憾的是，正当美中两国在不断探索缓和紧张之路的时候，在日美之间却正在出现完全相反的现象。以美国为主导的、用于日美防卫协力的“新防卫线”得以制定，在今年 4 月 28 日进行了周边事态法案的内阁会议决定。而且这还是在正值围绕着成为冷战开端的朝鲜半岛问题，韩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着为实现永久和平的“四国会谈”之时。

所谓“周边事态”不断出现的实际情况是对从“对立”到“对话”之道的一种探索。现在正是要睁开过去紧闭的双眼，认清盲目不清的现实的时候了。如果日本照现在这样下去，就会在远东局势转化的重要局面下，身背“历史重负”漂泊，而被大潮流所淘汰。

“人世间”由于思想意识上的对立以及“强权政治”而摇荡不定。但是正如第一章里讲述到的美国第十六代总统林肯所说的，以及在本章里写到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五句话”里所提到的那样，我们不能忘记：超越时代、永恒不变的“人生之路”是存在的。我想，只有站在这点之上，我们才能从“历史重负”中解脱出来，朝着二十一世纪，阔步走向与人共存的光辉大道。